夏家骏的《乾隆惩贪述评》（《求是学刊》第一辑）和关文发的《评嘉庆帝》（《武汉大学学报》第四期）等文，均有独特的见解。此外，对清朝一些开国勋臣的研究亦有起色，如陈涴的《论代善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社会科学辑刊》第五期）、孙文良、李治亭的《清开国勋臣何和礼》（《社会科学战线》第二期）、郑玉英的《宁完我简论》（《社会科学辑刊》第二期）和张嘉沧的《略论入清后的冯铨》（《史学月刊》第二期）等文，也值得一读。

五、关于民族史。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与发展，因之，研究和总结清朝在民族政策诸方面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汝珩、马大正在《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新疆大学学报》第一期）一文中，叙述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刚从俄国返回祖国，就前往承德会见乾隆帝的经过，进而论及清政府收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王希隆的《乾嘉时期清政府对哈萨克族之关系与政策》（同上），针对苏联史学界有人认为清政府对哈萨克族的统属关系是由于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从政治、经济和历史诸方面来论述清政府同哈萨克之间的密切关系。马汝珩在《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宁夏社会科学》第三期）一文中指出：“和卓家族作为一种宗教势力和社会力量，在清朝前期我国新疆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其势力的兴起与衰落有力地改变着新疆地区的政治形势、民族关系和宗教信仰的历史过程。”张捷夫《关于雍正西南改土归流的几个问题》（《清史论丛》第五辑），不同意所谓“改土归流的过程就是残酷的战争过程”的说法，认为“雍正年间清王朝在西南进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几次较大规模的用兵，时间不是在改土归流之前而是在改土归流之后，起因是土司势力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而进行拚死的反抗。因此，既不能认为土司的这种行动是正义的，甚至被说成是农民起义，也不能得出清王朝对土司的这种战争是反动战争的结论”。

另外，本年度在史学史、文学史、军事史、科技史、法制史和对外关系史方面，也发表了一些文章。因限于篇幅，故不赘述。

八四年的清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数百篇论著之中，有关理论探讨和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文章显得太少；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如财政、金融、漕运、水利和对外贸易等，仍未出现瞩目的成果。少数文章质量较差，缺乏新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评介

朱金甫

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思治教授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已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了。全书共辑入王思治、马汝珩、李鸿彬、金成基、林毓辉、王政尧、张晓虎等十六位作者所撰写的四十九篇清顺治以前的五十一名历史人物传记，约二十四万字。其中有后金和清初的帝王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及多尔衮等人，将相阿敏、济尔哈朗、多铎、范文程、冯铨等人，部院大臣车克、赵开心、杨义、魏裔介等人；有少数民族

领袖顾实汗、达赖五世、班禅四世等人；有著名反清志士归庄、阎尔梅、万寿祺、傅山等人或抗清起义领导人米喇印、丁国栋、于七等人；有政治和尚玉林琇、木陈忞、具德礼、茚溪森，也有西洋来华教士卫匡国、汤若望；有像马士英，阮大铖等南明佞臣，也有像孝庄文皇后博尔吉特氏那样的杰出女性。人数众多，品类齐全。尤其是过去不见经传的农民起义首领于七、难以进入正式传记的和尚玉林琇等人及确实对中西文化交流起过作用的西洋传教士卫匡国等，能在此书中为之立传，不禁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笔者有幸得见样书，先睹为快，深为书中各篇人物传记内容的翔实、见地的深刻以及文笔的生动所吸引，因此愿以拙笨之笔，先容于读者之前。

已有的清人传记，其种类和数量十分繁多，既有卷帙浩繁的《清史稿·列传》、《国朝耆献类征》、《满汉名臣传》、《国史列传》等较为正式的传记，更有各种杂史稗乘及方志文集中所保存的人物传记、行状、墓志铭等类。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仅从七十二种清人传记汇编所作的粗略估计，有传可寻的清代人物就达四万多人。但是，迄今为止，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而编写的清代人物传记，《清代人物传稿》却可算是第一部，此书的作者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所撰写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说明，有明确的观点和立场，爱憎鲜明，决不是纯客观的记述。但又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以记述传主的言行和事迹为主，作者的观点只是寓于叙事之中，并且将所叙事迹，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相密切结合。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是生活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作为一个社会的人，都是一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体现者。因此，此书对历史的主要事迹进行记述的同时，也注意阐明这些事迹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社会背景，以区别于旧式传记往往只孤立地以事系年月于某人，不能对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进行深入探索的缺陷。以书内各篇人物传记而言，无论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帝王，还是李森先、赵吉士等一般官员，虽然各人的经历不一、特点不一，或许仅仅从某一个人的传记之内，很难概括当时历史的全貌，但他们毕竟都是活动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错综复杂、风云变幻异常混乱的明清更替的时代。因此，只要把这些传记中的事迹相互联系起来就会交织成一幅宏阔的历史画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此书的各篇清人传记，远远高出了过去的各类人物传记。

撰写人物传记，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外，尤贵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真实和公正地反映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而所谓公正，首先应该真实，其关键则在于尽可能详细地占有材料和全面客观地研究材料。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清代人物传稿》的编著者们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人们都知道，在清史材料方面，情况极不一样。总的说来，可谓汗牛充栋，难以计数，收集工作十分不易，要在材料的海洋中把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事迹研究得十分透彻则更为困难。例如一些清代著名的帝王将相之类的人物，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对有些清代人物来说，材料却又非常缺乏，没有原料就难以动笔。例如一些农民起义的首领、释道者流或山野遗民的情况即是如此。然而《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者们，在搜集和整理材料方面确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书内的各篇人物传记，一般都是在查阅和依据了数十种甚至是上百种的有关论著或原始材料之后才成文的。如王思治的《皇太极传》和《多尔衮传》，仅在文中引据的材料就分别多达９５条和１０４条；王政尧的《魏裔介传》和陈金陵的《朱耷传》所引据的材料各在５０条以上；金成基的《福临传》、李鸿彬的《努尔哈赤传》所引据的材料则在４０条以上。由于材料的丰富，书内各篇人物传记不仅内容充实、情节丰满、有血有肉，

一扫旧式传记那种单调的套话和程式，而且真正做到了寓议论与事实之中，平允公正，基本避免了主观推论和武断。既没有写成人物论稿，也没有写成人物评传，这是很值得赞赏的。

传记的作者们对所撰写的人物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注意吸收国内外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以致使所撰写的人物传记本身就是最新的所究成果，这是《清代人物传稿》上篇第一卷的另一特色。历史所究离不开对一个个人物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不了解一个时代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就不会了解整个这一时代。甚至可以这样说，对每一个人物的具体研究，特别是对具有代表性的也即是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的人物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一个时代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一个个的历史人物的传记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往往会严重地影响到整个一代历史的真实与否。因此，力求人物传记的科学性，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我国过去固然不缺乏许多着笔严谨的人物传记，然而也确有不少真实性值得怀疑的劣作。尤其是许多散见于文集、家谱中的传记，往往是“谀墓”之作，隐恶扬善、沽名钓誉是屡见不鲜。《清代人物传稿》的编写者提出不溢羡、不隐恶、不随意取舍、不主观改铸的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他们在写作实践中也是比较严格地遵循了的。他们十分重视材料的搜集，但对材料的选择引用又大都是十分谨慎。他们十分强调材料的可靠性，对那些野史稗言中传说无据的史料，一概不予采用。他们重视新发现的材料，但又不单凭孤证而下结论。他们对众说纷纭的历史问题往往有自己的见解，然而又十分尊重不同的意见。他们对所撰写的历史人物都有概括的评价，但并不是随便的贴政治标签或戴空头的政治帽子。他们注意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认识，然而又反对牵强附会。他们尤注意国内外史学界对清代人物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努力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多尔衮传》、《福临传》、《孝庄文皇后传》、《范文程传》、《归庄传》、《玉林琇传》、《木陈忞传》、《苗溪森传》、《卫匡国传》、《于七传》等，无论从材料上还是在观点方面，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进展，并且提出了详尽的依据。有时在正文中不便于充分表达者，则在附注中一一列出，以便为读者提供进一步研究或判断的线索。例张李鸿彬的《孝庄文皇后传》，肯定了传主下嫁多尔衮之说，同时在其附注中详细地注明主张此说的依据；罗明在《侯方域传》的附注中，也注明了自己所持观点的各种依据；吕英凡的《傅山传》、陈金陵《朱耷传》等也均是如此。王思治的《卫匡国传》更是吸收了近年来国内外对卫匡国这一历史人物研究的最新成就之作。书中的内容，反映了此书编写者们在清史研究方面的功力大都比较深厚，书中大部份的人物传记，确实是一些研究之作，这也可以说是此书撰写得较为成功的根本原因。

文字流畅、妙笔传神，这是《清代人物传稿》的又一特色。应该承认，此书内的不少人物传记在撰写时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一卷的许多人物都是横跨明清两季，他们本身的经历既曲折复杂，当时的社会环境更是纷繁难测。然而此书的编写者们，有不少是理繁治乱的高手，不管头绪多么混乱和历史背景多么复杂，他们却能深入浅出、有条不紊。在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时，真可谓绘声绘色，各具文采。诸如努尔哈赤传、皇太极传的简洁明快，范文程、冷僧机、归庄传的隽永跌宕，冯铨、多尔衮传的心平气和，阎尔梅、万寿祺合传及米喇印、丁国栋合传的流畅优美，木陈忞、苗溪森传的恬淡清心，不仅使人读后增长历史知识、而且也是一种艺术享受。在编写者们的笔下，那些君王们的你死我活，文臣们的出谋划策，武将们的战争厮杀，忠臣们的刚直不阿，佞臣们的奸诈狡猾。以及志士遗民们的高风亮节，反清将士们的悲壮节烈，无不一一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不仅令读者心潮起伏，感情膨湃，

而且会从中深获教益，得到如何办事、如何治学、如何做人的某些启发。

总之，《清代人物传稿》写得比较成功，它必将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及各方面读者的欢迎。当然，它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也还有一些。例如在体例方面，作为一部多人合作的人物传稿，保持各个作者的个人风格虽然是可以的，但适当统一，尽量避免分歧也是必要的；又如：个别篇章的立论依据稍感单薄，个别引文未经慎重研究和鉴别；还如，个别作者似乎对自己所编写的历史人物有所偏爱，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作者的感情，不够心平气和等等。《清代人物传稿》将在“清史编委会”主持下，分上下两编分别编写和出版，上编为清代前期，下编为近代时期。两编将撰写两千个左右的清代人物传记，约分三十册陆续出版。《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卷的出版仅仅是一个开始，笔者希望在其后各卷的编写过程中，能保持和发扬第一卷的成绩和特色，减少或避免失误，并盼望这一成套的《清代人物传稿》早日全部与国内外广大读者见面。

纪念黄宗羲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将在杭州召开

今年正值黄宗羲逝世二百九十周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等单位已决定今年十一月在杭州举办第一次全国性的“纪念黄宗羲逝世二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黄宗羲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思想倾向及其在中国历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并将讨论与主题有关的明清社会、思想发展趋势和浙东学派形成与演变等问题。会议将邀请和欢迎著名专家以及确有研究成果的中青年学者参加，代表人数约在一百二十人左右。通过这次会议，将对全面研究黄宗羲的思想与学术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并对学术界深入开展明清学术史的研究起到促进作用。

（吴光）

河南固始县发现李鸿章、何绍基、左宗棠等人手稿

最近，河南固始县有关部门在收集资料时，发现一批装帧完好的李鸿章、何绍基、丁宝桢、左宗棠、汪鹤侪等人手稿五十余件。

这批手稿是固始县水利渔业局技术员吕满光家中珍藏的。吕的父亲过去是一位医生，爱好书法。解放初期在一偶然机会，得到了这批手稿，精心收藏，使手稿完好地保存下来。

一九七九年吕满光曾到郑州，把手稿送交一家文物单位鉴别，未受重视，后丢失几页。从此，吕满光再未让手稿露面。去年十二月，吕满光将手稿送交县政协领导同志观看，受到重视。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近代史的申松欣同志专程来到固始，通过甄别，证实手稿属李鸿章、何绍基、丁宝桢、左宗棠、汪鹤侪等人真迹。

这批手稿共五十余份，其中有李鸿章信笺手稿十五页，丁宝桢手稿二十二页，书法家何绍基手稿十七页及其它手稿。

手稿为李鸿章、何绍基、丁宝桢、左宗棠、汪鹤侪等人所相互往来之信。内容涉及军事、水利、人事等。如军事，提及捻军之事（信书有“围剿捻寇”）；水利上谈及黄河治理情况和治理方法。这批手稿，对研究清朝军事、水利等有一定参考价值。（晓钰）